

停罢科举后的特科余绪

关晓红

(中山大学 历史系, 广州 510275)

摘要:1905年清廷宣布立停科举,主要针对常科,并未触及恩科与特科。随着各省学堂的兴办、扩展及西学风行、儒学衰微,不断有人呼吁举办制科,借此保存国粹。清廷批准开科后,博学鸿词科因故未能落实,孝廉方正则在宣统年间两度开科,其初虽以德行、孝道为推荐的依据,而后却据考试成绩与报考者原有旧学功名分等录用,未见有挽回中学颓势的功效,却实际成为停罢科举后疏通旧学士子的一项善后措施。

关键词:停罢科举;特科;博学鸿词;孝廉方正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3)02-0106-06

清季科举停废,对近代中国社会知识与制度转型的影响毋庸置疑。但光宣之际的议复特科及其开考录用,作为科举停罢后增加的实际善后举措,与此前震动朝野的经济特科相比,或因参与者较少而未被时人瞩目,或因史事湮没而鲜为人知,甚少引起研究者的关注^①。拂去岁月的尘封,发掘与回顾这段史事,不仅可弥补既往科举制研究之缺阙,亦可增进对近代社会多重面相的了解认识。

一 晚清议改科举常科与特科

清代科举除分文、武科外,还有常科、恩科、制科之别^②。恩科与常科不同,虽然同属科举考试,却因没有固定期限,往往藉皇帝、太后寿辰或喜庆之事为由宣布开办;制科(即特科)亦是如此,开科全凭君王诏颁,不定期举行^③。

值得注意的是,晚清以来长达60年之久的改科举之议,屡屡以请求增开制科的方式将西学纳入科举。如1842年两广总督祁埴建议清廷仿唐宋科举广设科目,“将博通史鉴等五门分为五科,特诏举行”^④;1870年,闽浙总督英桂与船政大臣沈葆楨等附片奏请特开算学科^⑤;1875年,薛福成、李鸿章、沈葆楨相继奏请开设洋学特科^{[1]59-60,67,74-75};1884年,国子监司业潘衍桐奏请特开艺学科、方汝绍请开实学科^{[2]1741,1760};1903年,御史陈庆桂要求设置外交特科^{[3]卷四八七,439}等。这些奏折不仅曾先后上

达天听,且在殿堂之上有过多次讨论。但是,由于礼部对于求变心存抗拒、总理衙门则畏惧非议,结果是即使在同治中兴与光绪初年洋务大行其道之时,通过增开特科以充实和改造科举,即老树嫁接新枝的方式,纳实学和西学于科目的努力,仍归于徒劳无功^[4]。后因甲午战后朝野救亡呼声强烈,迫切需求人才,清廷于1897年批准开设经济特科与常科^{[5]11-12}。却又因百日维新夭折的影响,经济特科迟至新政伊始后的1903年方才开考,其间围绕推荐和取录,朝中明争暗斗,政情汹涌。出人意料的是,该科录取者引见后的安排,不惟与历科进士相比,并无特殊优待,甚至与咸同时期的一般保举案相比,拔擢也未见优势,连癸卯乡试考官吕珮芬闻之亦坦言“录用均不优异”^{[6]136}。因此,经济特科的举办,纵然对期待清廷呼应改革者具有一定鼓舞作用,但一科之后再无来者,更有诸多官场倾轧等难以为人所知的内幕使人望而却步,难以真正起到趋新人士所冀望的“开风气之先”的作用,对科举制改革不具备推广应用的现实性与持续性;改章后的科举文体,此时亦未能显示出可进一步更新的前景^[7];加上日俄战争的结局,使国人迫切向往立宪,期以救亡图强,但人才培养缓不济急,道光朝以来纳科举于学堂的设想,最终被以学堂包容科举取而代之。

1905年9月,清廷诏停科举(文科举),宣布自丙午科

收稿日期:2012-01-02

作者简介:关晓红(1957—),女,广东开平人,历史学博士,中山大学历史系近代中国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始停止常科之乡、会试及各省岁、科考试^{[8]114-115}，对恩科、特科问题并未触及。究竟是无意疏忽，抑或有意为之，目前尚未有资料证实。不过，立停科举缘自袁世凯等六督抚的奏请（《奏请立停科举以广学校并妥筹办法折》），恩科与制科（特科）不似常科已有固定章法与规范，其是否开科、何时举行，全凭君王好恶，并以谕旨昭告天下，故此专属君上之权，以示皇权至高、皇恩浩荡，臣下何敢非之夺之？

然而，距停罢科举仅仅两年，京中即屡闻请复科举之传言。如此逆风而行，以请开特科之名希冀科举浴火重生，与当时形势关系甚大，要因有三。其一，停科举后各地专注发展学堂，旧学由昔日主体沦为学堂分科教学的诸科之一，有日益边缘化的趋向，儒学延续已面临困境。其二，西学、新学的情况与之相反，由立停科举前始终难以栖身而一跃居于主导，受重视的情形日趋明显。各地此伏彼起的学潮虽由多种原因导致，但学堂学生的日趋活跃，及其对国家前途与自身命运的关注，与民主自由意识的觉醒不无关联，亦对统治者形成不小的威胁^{[9]359-370}。其三，与无系统时期学堂各自为政的情况迥异，立停科举后，兴建学堂被政府列入官员考绩的重要内容，随着各级各类学堂的急速扩展，新式学堂的诸多问题不断暴露、弊端显现，此前举国上下对于以学务为救亡图存不二法门的热切期待，以及对科举误国的指斥与摒弃，逐渐开始被怀疑、质疑所取代。因立停科举之诏未及制科，藉此之力以挽狂澜不倒，成为旧学卫道者们为数不多的选择。在此背景下，1907年至1908年，陆续有人奏请恢复科举考试，藉开考特科以存旧学科目的尝试，也被提上清政府的议事日程。有意思的是，改科举进程中的设特科（如经济特科）旨在开新，停科举之后的开特科则意在存古，对于旧学士子而言，自然变成原有科举善后方案之外的新增出路之一。

二 停罢科举后请复恩科制科

目前所见最早请复科举的奏议，是1907年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请开恩科。《盛京时报》题为《科举将复活矣》的报道，指此举将为恢复科举张本^[10]。在经后人整理出版的《恽毓鼎日记》中，未见相关记载，编辑者注明，相近时段的日记刚好有缺页。所以，恽毓鼎缘何在此时呈请开恩科，尚未见直接资料，但其对张之洞参与废科举的痛恨，斥之为“误人家国，为名教罪人”，自命以“今日欧风浸盛，礼教衰微，不揣孱弱，颇思以守先待后自任耳”的情感流露，却有迹可循^{[11]457,482}。

有意思的是，恽毓鼎请复恩科的消息刊载仅一周后，内阁中书黄运藩呈请都察院代奏的《整顿学务请复科举折》也赫然登报。两人事先是否暗中串联，不得而知。后

者所据理由为：“自古以来，拔取人才以科举得人最盛，现在科举一停，天下士人失望日久，恐生乱端，恳请按照专门各项科举，令该生自认何科，分门考试，而仍以经义为主，援照科场定章，录取后给予进士举人等项出身，以期广收实学而开士人取进之路，实与各学堂并行不悖。”^[12]所谓专门各项科举，即指特科。在须经童、乡、会试的进士科（即科举常科）停罢之后，将特科的传统称谓，冠以时尚的“专门各项”之名，以求保留科举的火种，可谓用心良苦。该折奉旨学部议奏。

学部的回应似乎出奇的快，且议复的态度坚决^⑥，认为所称科举、学堂并行不悖，“实于本部原奏宣布教育之宗旨不相符合。缘科举之停止，正为专办学堂起见，所期在教育普及，不在求一才一能而已。若科举一复，则天下士人势必两有观望，应请毋庸置议”；学部还强调：“时局阡危，非人莫济，因乏才而思兴学，因兴学而防流弊，是在端正学术，慎守宗旨，求整顿于学堂之中，断不能言造就于学堂之外”^[13]。学部的议复奉旨依议，第一次请复科举无果而终。

舆论对以恩科和特科名义请复科举的意向，似乎并不看好。《盛京时报》评论提醒当道，孝廉方正等制科，也是科举的一部分，“今日重逢乡举之人，大概皆毫耄期颐之老儒”，以此邀荣，停科举而不停制科，与兴学务实的宗旨相悖，主张干脆明令废止制科^[14]。

第二次请复科举，则是峰回路转，由学部内外多种力量促成。张之洞管部以及旧学衰微，是学部态度变化的重要因素^[15]。1908年8月，出于保存旧学及试办京师大学堂经学科的考虑，学部曾奏考博学鸿词科人员，并咨文各省，要求推荐耆儒硕彦。安徽巡抚冯煦以“经术湛深、学问博洽”为由，保送已奉旨赏给翰林院检讨的王闿运，以及王耕心、孙葆田、程朝仪、吴传绮、姚永朴、姚永概七人^[16]。其后，御史俾寿奏请开特科，经政务处议复，认为孝廉方正科、直言极谏两科“皆无甚实际”，若要开制科，则以博学鸿词对于保存旧学尚有实际作用，因其在“康熙、乾隆年间曾两次举行，试以经史论策诗赋，题义精实、文章宏伟、得人称盛，方今中国文学渐微，实有道丧文敝之忧，诸臣条陈议及此事者颇多，是保存国粹实为今日急务，拟请飭下学部详加筹议，应如何分析学问门类，如何荐举召试量才录用之处，奏明请旨遵行”，政务处在折尾特别强调：“惟此系专为提倡中国文学，各有取义，勿庸牵涉时务，以免淆杂。”^[17]即须以纯正旧学标准选取旧学人才，以防偏重新学之弊。

此后，又有吏部文选司员外郎黄允中条陈保存旧学必开制科，指出在“西学既已风行，新机绝无阻碍”的情形下，已出现“人情浮薄、士习支离、经史国文视如土芥”之

趋势,而“人心不正,病在本原”,“诚以因文见道,文不见为道所寄,道不能离文而立”,留读书种子之事已刻不容缓;该折进一步认为立停科举的善后措施,对旧学士子的安排考虑周详,“惟为旧学出途,非导后学先路也。……欲存国粹,无过于开制科”,强调了开制科对于旧学存续的重要意义,恢复制科“非为旧学之才计也,乃为引掖后进以延绵中学,扶持正学计耳。……近日人情浮薄,士习支离,经史国文视如土芥,世变方殷,可忧甚大,人心不正,病在本原”,“为往圣继绝学”,“实以道德文章之统,存亡绝续之机,所关非细”^[18]。按照折中的要求,该制科需三年三试(以子丑午酉为小试,参试者为生员;丑辰未戌为省试,参试者为举人;寅巳申亥举行京试,参试者为贡士、进士、庶吉士)。该折将恢复制科的理由提到延绵中学的高度,点中了新式学堂的软肋。旧学与中学相辅相成,过度冲击旧学,势必危及中学的兴衰存亡。停罢科举后,学堂虽然设有各式读经课程,可是其不仅沦为诸科之一,而且往往形同虚设,教学双方都敷衍了事。长此以往,中学势必走向衰微。通过举办制科保存旧学人才,藉此减缓旧学颓势,既是情非得已的选择,也是因势利导的善后举措之一。该折光绪三十四年九月二十九日(1908年10月23日)奉旨:“学部知道,钦此。相应传知贵部钦遵可也。此交(计黏抄折一件)。”^[19]此谕旨为知照,而非学部议复,即可照此办理,学部只须考虑如何贯彻落实。

三 开考特科

清廷及其相关部门对通过开办制科的方式以表明对旧学人才的珍重已无异议,舆论界的反应则不尽然。1908年11月,《大公报》有评论指出,由于科举、捐纳、保举三途并进,仕途早已人满为患,优拔贡考试与留学生考试交替进行,均较科举时代名额更多且更易取中;博学鸿词又开科在即,科举实未废也;而科举、捐纳、保举相互混杂,变本加厉,所谓人才则多途并进,车载斗量,已有过滥之嫌^[20]。其后又发表评论,表达对博学鸿词开科的怀疑,文章追溯博学鸿词设科的历史,指出该科是为文学出类拔萃者如韩愈、苏轼之人获选而设,本朝曾开科两次,拔擢者或任史官、或为制诰;认为此时开科,虽藉名保存国粹,与大学分科匹配,不仅能否得人未可知之,且与预备立宪的时势全不适宜^[21]。

在具体操作层面,开办制科也遭遇尴尬。原来学部拟在宣统元年二月举行博学鸿词科,但因各省尚未将合格人员保送来京,张之洞与荣庆商量后,只得延展至八月间再行考试,并通知各省从速物色^[22]。然而,学部多次催促各省保送人才,收效甚微^[23];不得已,只好一再展期^[24]。据说学部尚书荣庆对开博学鸿词科“颇不赞成”,认为此事虽寓意保存国粹,但恐因此导向士风趋重浮文、

轻视实学,反而对教育大有妨碍,主张俟张之洞假满之后“再行核议”^[25]。此事发端,或与张之洞关系匪浅,故其逝世后便传出罢议之讯^⑦。

另据《清史稿》记载:清政府“遂诏各省征召耆儒硕彦,湖南举人王闿运被荐,授翰林检讨”;两江、安徽相继荐举,“部议以诸人覃研经史,合于词科之选,俟章程议定,陈请举行。未几,德宗崩,遂寝”^[26]卷一〇九,3179-3180。后因京师大学堂经学科开办,按奖励学堂章程的规定,毕业亦可授予进士,故博学鸿词已无开科必要。《大公报》注意到:“政府以博学鸿词科各省保送者甚属寥寥,现时经文各科大学已将次开办,博学鸿词未便再设一格,转使士习多歧,因拟将该科实行停止,不日即行具奏。”^[27]

值得注意的是,政务处及学部看重的博学鸿词特科虽议而未行,相近时间,原本被视为“无甚实际”的孝廉方正科却后来居上,成为停罢科举后实际落实开办的特科。

据《清朝续文献通考》、《清实录》等记载,清廷自雍正元年始,每值新帝登基,均颁恩诏举办孝廉方正特科,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朝亦皆因袭旧例^[28]卷八十八,选举考五,8649,以示承继大统必以孝行治天下。光宣改元之际,以皇上御极,循例恩诏每府州县卫举孝廉方正,开特科以庆贺。礼部咨文各省,由各府县推荐人选,凡朴实拘谨、无其他技能、不能参加考试者可直接予六品荣衔;凡德行与才识并优者给咨赴部考试,试后带领引见,候旨简用^[29]。

1909年8月,学部通飭各省,慎选孝廉方正,“务于各该州县公举之后,由官察其品行,试其学识,至甄录之法,仍需品重于学,以昭端本”^[30]。学部的做法,本与孝廉方正科侧重孝行的特点相符,即更多地强调品行而非学识,未料因此而便利各省冒滥。1909年12月,御史饶芝祥奏称,各地选送孝廉方正科,存在选举不实、选额不严、年龄无限三种流弊,仅湖北黄冈一县竟推荐多达十余人,因此请予严定章程,防止冒滥;吏部议复,除要求督抚核实所荐人员外,对选额与年龄均未加限制^[31]。由于宣统朝开元时值科举停罢之后,吏部显然有藉此拓宽士子出路的考量,故与前述几朝相比,规模与数量均有增多;其后因冒滥情形愈加混乱,吏部不得不对既定方案有所调整,原定孝廉方正科连续八年开科,每年只要有三名以上被推荐者到部,即可在二月至八月间开考一次;后吏部奏准将八年连续开科“酌减”为四年,从宣统元年至宣统四年,每年八月举行一次考试^[32]。开科年份虽然酌减,名额却并无限制。既往孝廉方正科每届报名不过三、四十人,且向不分等,一体带领引见授职。宣统二年,吏部以两逢大恩,专折请旨增额,报名人数规模空前,达到600多人。

在报考录用程序方面,吏部议定:1.孝廉方正由官绅

推举,被推荐者若不愿参加会考,则可免试而直接给予六品职衔;2.被推荐者若“有志上进”,希望获得更高的职衔,则需要遵循一定的程序,先由各州县详选事实清册,呈送各省司道,再由司道出具切实考语,转详各督抚,由督抚奏闻,经礼部核复,一并咨送吏部,在吏部参加会考;3.会考取录者再参加朝考,经钦派大臣阅卷,拟定等第,优等“以知县分省,归孝廉方正班候补;其次以布库盐道各大使、直州判、州判、县丞、府经、教职等项掣签,掣省亦均归孝廉方正班补用”,考虑到候补官中“各大使及州判等项均极拥挤,而教职一项又复裁撤殆尽,若仍以前旧例任用,则将来恐永无补缺之期,殊不足以广皇恩而示体恤”,故吏部堂官会议决定对旧例进行变通,“拟廷对录取者以小京官、知县、县丞、府经、主簿、吏目六项任用,其余均奖五品顶戴,遣归田里”^[33]。

吏部初议未免过宽过优,为免遭物议,最终权衡利弊,拟按照考试成绩分别录用:“择其学有根柢通晓时务者列为一等,举人五贡及底官应升知县者以知县用,廩增附监及毕业各生以直隶州州判、州判、盐运司经历用;次者列为二等,举人以六品之直隶州州同、布政司经历、布政司理问,五贡以七品之直隶州州判、州判、盐运司经历用;廩增附监及毕业各生以八品之府经历、县丞,九品之州吏目、县主簿、道库大使、巡检用;均俟引见后恭候钦定,分别录用。此外未经录用之员,无庸带领引见,照例给予六品顶戴,作为正途出身。”^[34]这些规定表明,立停科举后的孝廉方正特科,最初推荐虽以德行为和孝道为评判依据,真正录用时却须依据考试成绩与原有旧学的出身分等,实有悖该科之名。据督抚奏报,仅山东一省,即有附生李伯昌等74人至礼部验试,另有143名孝廉“文理稍逊,请给予六品顶戴荣身”^[35],其规模、人数与优待程度,逾越此前历朝。

有鉴于宣统二年孝廉方正科的鼎盛,宣统三年再次于八月下旬举行又一届孝廉方正科,据《大公报》报道,报名应试者有340人^[36]。所举孝廉方正科,择人任用本应名实相符,以尊崇践行三纲五常的成绩口碑为主要依据。此时却更多依照旧学功名的层级,且以其是否“学有根柢、通晓时务”区分优劣。如此不伦不类,却亦折射出时代变迁的影响下,选材标准已颇多改观,以至于方方面面都要与时俱进。如此,则停罢科举常科后举办的特科,虽然舆论不以为然,但实际仍起到一些疏通旧学的作用。据《大公报》推测,清季四年中荐举的孝廉方正当在2000名上下,以此而得官者亦有300多人;在该报看来,在仕途异常拥挤之时增此闲僚,于吏治有害无益;既然国家能将沿用数百年的乡、会试毅然去之,何以独于毫无实际的孝廉方正屡次考试,贻笑大方^[36]。

孝廉方正科的相继举办,虽对振兴中学尚无明显功效,对维护旧学却有一定暗示及鼓舞。1909年初,御史李灼华条陈请复岁、科两试,奉旨交学部议奏,“顷闻荣尚书颇不以此举为然,已拟议驳不准,已俟与张相国核妥,即行具折复奏”^[37]。《大公报》的评论认为,新旧学考试接踵而至,延绵不绝,人才不患无多,至于是否可以藉此振兴中国,则颇可质疑^[38]。

四 善后未尽事宜

科举善后,实际上应当包括筹措士子出路与存续旧学精华两项内容。最初的筹议考虑显然忽略了后者,而集中于为士子安排出路一面。立停科举后,随着新学推广过程中出现越来越多问题,学堂学生的国文程度备受世人诟病,通过开制科存续旧学被提上日程,可实际效果除进一步疏通旧学士子的出路外,并没有起到保存国粹的作用。张之洞主政学部后,亦曾力图纠正学堂主导之下中学面临湮灭之偏^[15],存古学堂也曾喧闹一时,学部亦有整顿学堂经学课程的考虑^[37]。然时过境迁,挽回旧学颓势的种种努力依然成效甚微,充分暴露出科举善后在更深的文化层面关照不足。

虽说清廷对于安排旧学士子出路已尽可能充分考虑,给予各种优惠,并努力贯彻落实各项措施,但对于善后的理解略嫌简单狭隘。一方面,宽筹出路还是有所遗漏,使得没有科举功名、终生困顿举业的老童生不免向隅之苦;另一方面,对于举贡生监又太过优待,各省推荐的孝廉方正科名单也绝大部分是这一人群,以致引起舆论的强烈不满和抨击。

而在科举余绪的反衬之下,一部分学堂学生对于科举功名虽仍然仰慕,向学之心却大受影响,且以“有用”与“无用”作为权衡,以时务为时尚,对经学等课程日渐漠视,中学的传承更加岌岌可危。学堂教育也始终不上轨道,致使问题层出不穷,社会争议持续不断。吊诡的是,学堂育才成效不彰,实际上反而成为科举善后效果不佳的最直接证明。

《清史稿》这样记述立停科举善后与儒学兴衰的关系:“光绪末,科举废,丙午并停岁、科试。天下生员无所托业,乃议广用途,许考各部院誊录。并于考优年,令州县官、教官会保申送督、抚、学政,考取文理畅达、事理明晰者,大省百名,中省七十名,小省五十名,咨部以巡检、典史分别注选,或分发试用。各省学政改司考校学堂。未几学政裁,教官停选。在职者,凡生员考职、孝廉方正各事属之,俸满用知县,或以直州同、盐库大使用。儒学虽不废,名存实亡,非一日矣。”^{[26]卷一〇六,3118}自隋唐之后,科举成为儒学的重要载体,立停科举后,学政裁撤、教官停选,虽然经学课程列入学制,但就学习内容而言,却是

由既往的主体成为了分支^⑧,尽管有孝廉方正等特科及存 古学堂的回光返照,儒学昔日的辉煌毕竟一去不复返了。

注释:

- ①与本专题相关的学术进展:何玲对经济特科始末进行了考证(何玲《清末经济特科探析》,《历史档案》2004年第1期);商衍鏊梳理了清代制科的沿革,注意到光绪三十四年御史俾寿请开制科与政务处的态度,惟其对孝廉方正科的叙述止于嘉道时期,其第四章《停科举后之各项考试》,亦未及制科议复与开考(参见:商衍鏊《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73-178页)。至于停科举后的特科,以笔者手眼所及,其余研究或因问题侧重及视角不同鲜有涉及。
- ②科举考试按内容与类别,大致分为常科和制科两类。两者虽均以选拔人材为目的,但常科系指固定时间、固定科目的考试,包括岁试、院试及乡、会试;制科则是由皇帝临时下诏举行,各地保荐或推荐,时间与科目不固定的考试。唐代常科内容丰富,制科亦名目繁多,有贤良方正、博学通艺等数十种。“汉以后凡天子特诏曰制举,又曰制科是也”,因制科“系奉特旨举行,与常行科目不同”(乾隆官修《清朝文献通考》,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5351页)。
- ③“制科虽等荐贤,但其设科之意,亦属于科举之类耳。”参见:商衍鏊《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第173页。
- ④《请推广文武科试疏》,盛康辑《皇朝经世文编续编》卷六六《礼政六·贡举》。
- ⑤礼部议复:“事多窒碍……所有该督等奏特开算学一科,应毋庸议。”参见:《礼部奏请考试算学折稿》,《万国公报》第2册,台湾华文书局影印本,卷327,第734页。
- ⑥学部不能容忍科举与学堂各自以独立的形式并存,认为这将极大妨碍学堂生存,而立停科举的设计则是科举与学堂合并,即溶科举于学堂之中。详见: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待版。
- ⑦“据学部人云,举办博学鸿词一事,系张文襄公所发起,枢府、学部诸公均不甚赞成,今文襄公既已去世,将来此事恐当做罢议也。”(《博学鸿词行将罢议》,《大公报》1909年10月11日第1张第5版。)另有一说,某枢臣认为,某御史请开博学鸿词科,是投张之洞所好,“其实张相国对于此举并不以为然”(《议停博学鸿词科》,《大公报》1908年12月24日)。此外,张之洞任管理学部大臣后,虽力主设置存古学堂,对请复科举之议并不附和,甚至传说在郎润园王公大臣集议时,表示“嗣后再有此等事,即以莠言乱政例治罪”(《议驳请复科举》,《大公报》1907年9月12日)。
- ⑧经学进入与退出清季学堂的情形较为复杂,但大致趋向是由主体变为分支。参见:朱贞《清季民初的学制、学堂与经学》,中山大学历史系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未刊。

参考文献:

- [1]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第1册[G].北京:中华书局,1958.
- [2]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第2册[G].北京:中华书局,1958.
- [3]德宗景皇帝实录[G]//清实录:第58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7.
- [4]关晓红.晚清议改科举新探[J].史学月刊,2007,(9).
- [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朝上谕档:第24册[G].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 [6]吕珮芬.湘韶日记[G]//李德龙,余冰.历代日记丛钞:第154册.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
- [7]关晓红.清季科举改革与停废科举[J].近代史研究,2013,(1).
- [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朝上谕档:第31册[G].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 [9]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
- [10]科举将复活矣[N].盛京时报,1907-08-29.
- [11]恽毓鼎澄斋日记:第2册[M].史晓风整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
- [12]黄中书请复科举之措词[N].申报,1907-09-07.
- [13]议复中书黄运藩请复科举折[J].学部官报,1907,(35):230.
- [14]论乡举重逢之典[N].盛京时报,1908-04-10.
- [15]关晓红.张之洞与晚清学部[J].历史研究,2000,(3).
- [16]学部奏考博学鸿词人员[N].盛京时报,1908-10-31.
- [17]会议政务处议复御史俾寿请开制科片[J].政治官报,1908,(340):9-10.
- [18]都察院代递吏部文选司员外郎黄允中条陈保存旧学必开制科呈[J].政治官报,1908,(375):3-5.
- [1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朝上谕档:第34册[G].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 [20]论近日取人之弊[N].大公报,1908-11-08.

- [21]对于博学鸿词科之疑团[N]. 大公报, 1908-12-23.
- [22]博学鸿词之近闻[N]. 申报, 1909-03-06.
- [23]催保博学鸿词人员[N]. 大公报, 1909-02-13.
- [24]博学鸿词科之展缓[N]. 大公报, 1909-02-28.
- [25]荣相对于博学鸿词之评论[N]. 大公报, 1909-09-29.
- [26]赵尔巽, 等. 清史稿[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8.
- [27]博学鸿词科停止之近耗[N]. 大公报, 1909-11-23.
- [28]清朝续文献通考: 第1册[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0.
- [29]浙江巡抚增韞奏公举孝廉方正折[J]. 政治官报, 1909, (808): 8-9.
- [30]通飭慎选孝廉方正[N]. 大公报, 1909-08-17.
- [31]吏部奏遵议御史饶芝祥奏孝廉方正冒滥请定章程折[N]. 大公报, 1909-12-13&14.
- [32]吉林巡抚陈昭常奏荐举孝廉方正折[J]. 政治官报, 1910, (979): 13-14.
- [33]吏部为孝廉方正宽筹出路[N]. 申报, 1910-09-07.
- [34]变通孝廉方正录用办法入奏[N]. 申报, 1910-10-03.
- [35]山东巡抚孙宝琦奏荐举孝廉方正折[J]. 政治官报, 1910, (988): 9.
- [36]无妄. 闻考试孝廉方正书感[N]. 大公报, 1911-10-12.
- [37]学部整顿经学之急迫[N]. 盛京时报, 1909-02-19.
- [38]闲评一[N]. 大公报, 1910-09-05.

On the Remaining of Teke After the Abolishment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GUAN Xiao-ho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275, China)

Abstract: The abolishment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examination system, in 1905 didn't include Enke and Teke. With the new schools appearing and spreading in many provinces, the western style of schooling became the dominant and the traditional style declined. Thus, many people call for the recovery of Zhike to inherit Chinese tradition. With the permission of the Qing emperor, two types of examinations named Boxuehongci and Xiaolianfangzheng was proposed. Although the examination of Boxuehongci was not brought into practice for some reasons, the examination of Xiaolianfangzheng was put into practice twice during the Xuantong Period (1908-1911). At first, the candidates' virtue and filial piety were the only criteria of assessment. Gradually, the scores of exams and the past exam records of candidates took place. Thus, the recovery of Zhike failed to save tradi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system. Nevertheless, it did work as a rehabilitative measure for those students and scholars educated in tradi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system.

Key words: the abolishment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Teke ; Boxuehongci; Xiaolianfangzheng

[责任编辑: 凌兴珍]